

中国实习劳工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陈慧玲^①

内容摘要：学生实习已经成为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旨在探讨实习生面对的特殊雇佣关系，了解他们的工作处境，就是在劳动过程中占据了一个介于学生和工人之间的模糊位置。目前企业一般自行招募实习生，或通过地方政府和私人的中介机构进行大规模动员。校企合作之下，老师的介入加强了实习过程中对学生的劳动控制。当这些实习生被要求和其他工人一样工作时，他们的薪酬和福利待遇却往往低于一般工人，甚至是无酬的。近年来，以实习之名而使用童工为实的事件曝光以后，政府官员和公司主管被迫采用了一些应对措施。然而，在快速发展的“实习经济”中，要实现实习劳工的基本教育和劳动权利仍是困难重重。

关键词：实习劳工 学生工 实习 职业技术学校 中介 国家政府 中国
现代教育体系中，医护专业，酒店和旅游、创意产业，文化工业及其他许多领域通常要求学生进行实习以获得相关资历（Perlin, 2012; de Peuter, Cohen, and Brophy, 2015）。在中国，实习在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中是强制性的。本文尝试在急剧变化的劳动市场和教育改革的环境中，解释实习劳工数量增长这一现象，并深入探讨企业、劳务派遣机构、职业技术学校和地方政府在招聘和管理实习生方面扮演的角色。

回顾文献，学者对教育商品化的研究清楚表明，在中国改革开放下职业学校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他们纷纷通过扩大招生数量和参与商业伙伴关系来使资金来源多元化，教学和学习的质量因而参差不齐（Kuczera and Field, 2010）。

^① 作者特别感谢侯力琪博士研究生的悉心帮忙，她也十分感激受访者的帮助。潘毅，Mark Selden，朱燕华，陈诗韵，吴红梅，Amanda Bell，Jeff Hermanson，Greg Fay，Chris Smith，Tim Pringle，Rachel Murphy 和 Nandini Gooptu 在研究方面予以许多支持。黄宗智和 Richard Gunde 在写作过程中提供了很好的建议。Modern China 以及《中国乡村研究》的匿名评审人给了宝贵的意见。本文曾提交于德国社会学学会第三十八届大会，该会议在 2016 年 9 月 26 日至 30 日于德国班贝格大学召开，会上“中国劳工”讨论组两位主持人和与会者的评论让作者获益匪浅。最后，本文来自于 John Fell 牛津大学出版社研究基金（ref 152/015）和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资助的研究。

Terry Woronov (2016) 和凌旻华 (2015) 分别在她们的民族志研究中观察到,“混日子”也就是消磨岁月已普遍成为职校学生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这些学生不再面临考试带来的繁重的学业压力。在教学资源匮乏和管理不善的学校里,许多学生甚至有一种自暴自弃式的幻灭感,继而辍学。每天仍然去上学的,他们有的玩手机和网络游戏,有的看漫画,有的在那些讲得很糟糕的课堂上就自然而然地睡着了。因此,职业学校教育为人诟病,沦为那些在主流考试系统中失败的“坏学生的蓄水池”。

从在学校学习到工作的过渡期,本文着眼于学生实习的具体安排与实习生的劳动经验。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者 Guy Standing (2011: 16) 曾大胆评论,“实习可能是使青少年向下流的渠道”。那么,在当今中国社会里,一个由职校学生支撑的“实习经济”是否正在快速发展,它又会对青年劳工带来怎么样的改变和影响呢?在 2011 年至 2012 年间,笔者在四川和广东访问了 38 位来自农民工家庭的实习生和 14 位参与了实习项目的老师,他们来自于 8 所不同的职校,但都被纳入到同一个实习项目,由台资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主持。据了解,富士康正运营着全球规模最大的实习项目。2016 年 8 月,笔者进行了补充性的田野调查,并且在博士论文研究的基础上延伸出去,访谈了一家位于江苏省内的私人劳务中介机构的三位经理,他们负责向客户介绍及分配学生进行实习,并不断开拓劳务派遣主要的业务。除了分析这些一手的质性研究数据,笔者还回顾了过去四十年间在学生实习管理方面的教育政策和劳动改革的进程。事实上,中国最新修订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已于 2016 年 4 月正式生效,本文在总结部分简要评估它对实习生权益及劳动力非正规化现象可能带来的后果。

中国的劳动力非正规化

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职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与他们在高中和大学里的同龄人一起,会被分配到国有企业或者集体部门,从而享有高水平的工作保障。随着市场改革和企业重组的加深,这种通过政府计划而进行的工作分配系统被逐步淘汰 (Hoffman, 2001)。今天在中国就业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求职者需要为自己的未来承担全部责任。这种新型的自由社会思潮以个人的成败为核心,强调年轻人要奋发努力,争取向上流动;而现代的企业则趋向利润最大化,追求组织效率,管理讲究自主自为 (Gallagher, 2005; Harvey, 2005)。现在,工作场所大多“灵活地”运用不同的劳动关系、工作模式与就业条件,依据各人的教育资历和综合素质的差异而设有不同的待遇标准。

这样，中国劳动力的构成相较市场改革初期越来越多样化，劳资纠纷也不时有发生。在《在中国的汽车制造厂里》(*Inside China's Automobile Factories*)一书中，张璐(Zhang, 2015)展现了临时工包括派遣工和实习生的处境，他们是现代汽车制造业以至整个劳动市场里的生力军，因应业界在全球化下面临削减成本和增加生产效率的双重压力下，被大幅调动起来。汽车生产一方面通过使用低成本的青壮年工人队伍而进一步提高劳动强度，尤其在生产的旺季；另一方面应用先进的自动化机械和优良的技术取代传统人力劳动，加快生产速度。在她调查的组装厂，临时工的工资仅仅是正式工人的一半或三分之二，而所得到的福利待遇也少得多，同工而不同酬。除了以出口为主导的制造业，政府政策也倾向于刺激内需，扶助各种从低端到高薪的服务行业。近年来，服务业劳动力的增长，持续地较制造业为高(Evans 和 Staveteig, 2009)。于是，实习生(interns)或练习生(trainees)成为在工厂、酒店、地铁站和其他工作场所的非正规工人，他们是非标准劳动关系下的新锐劳动者。参照现行中国相关的法律框架，在实习企业单位里进行实习的学生，其法定身份仍然是学生，而不是雇员(Smith and Chan, 2015; Chan, Pun and Selden, 2015; Pun and Koo, 2015; Su, 2010; Otis, 2009)。

我们知道，虽然目前有国家法规和国际法规保护实习生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基本劳动权益，但是雇主经常忽视自身应有的责任却不必遭受惩罚，法律无法真正彰显公义。相关侵权的具体例子，已在法律学者 Earl Brown and Kyle de Cant 撰写的文章(Brown and de Cant, 2014)、作家 Ross Perlin 的《实习生国家》(*Intern Nation*) (2012) 专著以及三位从事大众文化和社会传播理论研究的学者 Greig de Peuter, Nichole Chohen 和 Enda Brophy 为了《三C：传播、资本主义和批判》(*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期刊而策划的特别专题“质问实习制度”(*Interrogating Internships*) (de Peuter, Chohen and Enda Brophy 2015) 中一一列明。有趣的问题是，那么到底实习生是如何成为了廉价的、容易被取替的低技术劳动力呢？在全球高端电子产品制造业链条上，陈慧玲、潘毅和塞尔登(Chan, Pun and Selden, 2015)通过他们进行的对富士康——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业代工制造商(contract manufacturer)——一项大规模的劳动条件调查，深入展示了中国内地由省政府到乡镇政府在其中发挥的关键角色。调查发现，政府跨部门合作，有效地直接干预职校政策而操纵实习，从而满足了富士康等超大企业对用工方面的灵活需求。在整个实习阶段，各级地方官员和实习指导老师联合的“看得见的手”很明显地进行学生动员，以及在工厂内施以严密的管理，确保实习生百分之百顺从，完成所谓的实习。然而，在地方政

府、学校和资本三者之间就学生实习问题上作出强制性的安排，结果是极不理想也不稳定的。

在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厂所发生的工潮便是例证。在车间里实习生和工人们在 2010 年 5 月下旬至 6 月初曾多次发动了全厂大罢工，使得本田在中国国内整个原来组织上严密的、即时供应不断的制造网络，很快陷入彻底瘫痪。一边是工厂管理者和管理实习的教师，另一边是年轻的工人包括大批实习学生，尽管两者之间权力极不对称，最后，罢工者还是在社会各界人士如学者、民间劳工运动组织者等的支持下赢得了大笔加薪（Butollo and ten Brink, 2012; Chan and Hui, 2014; Lyddon et al., 2015）。研究人员相信，这些学生的同学和朋友都搭乘公司的摆渡车上班，都住在同样的宿舍里，久而久之，他们在内部凝聚团结起来，并通过集体行动支持工人领袖，争取加薪和更合理的待遇。尽管市级的和更高级别的工会很不愿同意工人们对公司工会进行改革的要求，但他们被迫介入调停工资纠纷，以恢复生产秩序和社会稳定，实习生和他们的工友可谓胜了一仗（Friedman, 2014; China Labor Bulletin, 2015）。

实习生抗争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它们势必与日俱增，尤其近年社会经济增速放缓，企业面对减省用工成本、灵活生产的压力，纷纷积极主动寻求职业技术学校、劳务中介机构和地方政府等的合作，招揽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工。在这样的环境之中，青少年实习学生面临着复杂的、多重的权力结构。这一重大的问题却还未被深入剖析。本文将会揭示资本和政府共同塑造实习体系，联手通过劳动分包利用学生劳动力以达至其目的。事实上，当学校根本没有服务于实习生的学习目标，而是与企业雇主、地方政府官员、劳务中介机构等结盟，派遣实习生工作，就只会加剧不平等的状况。

职业教育和学生实习

职业技术学校为已经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学生提供以就业为导向的课程。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入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人数与入读高中的学生人数大体相等（教育部，2015）。然而，图 1 显示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全国范围内高中开始比中等职业学校吸引更多的学生。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数量从 2001 年的 1170 万翻倍到 2010 年的 2240 万，但到 2014 年已降至 1800 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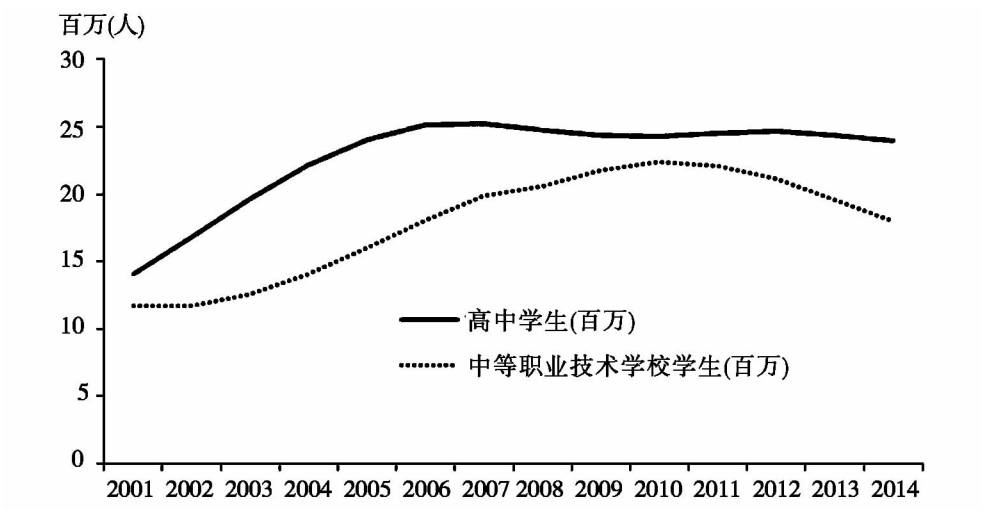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高中学生的构成 (2001-2014)

注：入读“成人高中”的学生人数很少（占总人数的 0.3%—1.2%），未显示于图中。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5 年。

职业学校应遵循“工学结合”的模式，正如 199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所规定的，强调“产教结合”。现存职校开办的课程，一般为期三年（中专）到五年（3 + 2，从中专到大专）。在各种职业培训项目中，对于中职生或者高职生而言，最值得关注的是在课堂上和在实习中的教学质量问题。从技能培训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实习——即算是“免费工作”或者“为微薄的薪水工作”——被新自由主义思路的政策制定者塑造成一种“对未来的投资”，而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被实习生自己合理化或内在化，即便是在可预见的高度不确定性的就业情况之下（Hope 和 Figiel，2015）。

据悉英国和美国等地一些年轻实习学生是来自条件较优裕的家庭，因此，他们可以暂时抛开拼命赚钱的担子，并透过无偿的实习获取相关技能，希望早日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Perlin，2012）。相比之下，中国的职校学生大多是来自农村或城市打工阶层的家庭，经济条件相当有限（Woronov，2016）。在上海，调查发现作为第二代民工的子女，能够在他们的全日制学习和兼职工作中建立有用的社交网络，并有可能最终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向上流动，也就是说，职业教育与培训有其价值（Ling，2015）。

笔者进行实地访谈的时候，一所培训“设备与机械技术人员”、有 6000 名在校生的职业学校这样宣传道：

学一技之长，创一番事业；

学一技之长，创一片蓝天。

另一所更大的、专门从事汽车修理和移动机械的学校，有 7000 名学生。该校的招生手册详细阐述了“学习真正的技术”的重要性：

国家政策好，家庭困难可免学费！

不学技术去打工，将贻误终生！

世间艺业要会一件，有时贫穷教你患难！

父母有眼光，让儿学技术！

学真正技术，到驻马店高级技工学校！

钱财有限，技术致富！

×××高级技工学校是技术人才的摇篮！

年轻不学技，年长悔莫及！

一技在身，走遍天下，受益终生！

打工不养老，养老靠技术！

学校的招生工程十分强调学习技术，据说这能够为职业发展和终身个人保障提供坚实的基础，对学生和家长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这样，职业教育恰恰处在教育和经济的交叉点上。事实上，国家领导人期望通过改进和扩大在各个层面上的职业专业培训来培养有技术的劳动力，振兴经济。最为明确的官方目标是，到 2020 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将达到 2350 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数的 50%（教育部，2010a：表 1；教育部等，2014：表 1）。

学生专业与实习脱节

实习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有些是由学生自己主动选择的；另外一些则由学校代表学生来组织，并要求学生完成指定的学习要求，作为重要的考核。良好的实习项目是参与性、反思性的，有助于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并与他们的专业领域有关（Ip，2015）。相比之下，笔者的研究显示，实习生在富士康的工作岗位与他们自己的专业领域并不相关。

根据国家相关的规定，学生进行“顶岗实习”应该跟所学的专业对口，并且在入读职校的第三年也就是最后一年进行。38 位受访的实习生分别学习艺术、建筑、石油化工、汽车修理、中草药、园艺、秘书服务、计算机应用、商业管理、会计、纺织、电子和机械等专业。这些实习生中只有 8 位是三年级学生。受访学生的平均年龄是 16.5 岁，略高于国家法定的最低工作年龄（16 岁）。就实

习时间而言，14名被派往富士康的老师透露，公司经常延长学生实习的时间以满足生产需要。在调查期间，实习时期从三个月到一整年不等。无论是实习老师，还是企业主管，对学生的技能技术培训的基本需求关注非常不足。

一位16岁的富士康实习生说：“我们一天十几个小时站在流水线上操作机器，你觉得我们学到了什么？什么是实习？与我们在学校学的东西没有关系。每天只是重复一两个简单的动作，像个机器人。”富士康的实习生从事着繁重的工作，每10—12小时才换一次班，每周要工作6—7天。2007年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规定，“实习生每天工作不得超过8小时”（教育部和财政部，2007）。2010年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应对企业技工荒进一步做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不得安排学生每天顶岗实习超过8小时”（教育部，2010b）。不但实习生的轮班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而且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2012年修订，2013年施行）的规定，他们的所有培训都必须在白天进行，以确保学生的安全及身心健康。其中第二十条规定，学校，包括职业学校，应当“与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互相配合，保证未成年学生的睡眠、娱乐和体育锻炼时间，不得加重其学习负担”。而事实上，很多企业会无视法律的条款和精神，富士康的那些16—18岁的实习学生们与正规工人处于相同的工作状态之中，包括交替的白班和夜班以及大量的加班。

在解释实习的规划和目的时，一位老师向笔者展示了以下这封学校写给学生父母的《告家长书》：

通过此次实践活动，对学生进行以敬业爱岗、诚实守信为重点的职业道德教育，帮助学生认识企业，熟悉企业环境和企业文化，使学生在学中做、做中学中建立起员工意识，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综合素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为今后进入职场奠定基础。

这封信以道德高调声称，通过学校分配的实习，学生在市场上的就业能力将得到加强。但是这封信既没有讲明“实践活动”的内容，也没有提供任何关于技术培训课程的信息。

一名17岁的实习生回忆说：“我在2009年9月开始学汽车修理专业。根据课程设置，专业培训要持续三年：两年在学校，第三年顶岗实习。”但是在学习该专业不到一年后，2010年6月，他和同学们已经被送到富士康在深圳的生产基地，展开为期长达整整七个月的所谓实习。事实上，他们并不是生产汽车，而是生产iPhone。“又累又浪费时间”。他总结说。在他们回到学校后不久，2011年4月，学校开始为准毕业生安排实习。“学校还没有完成为我们规划的专业课程就已经开始分配实习任务了。我们甚至还没有学完我们专业的核心课程，也没

有掌握汽车修理的基本技能，这样怎么能在一家汽车公司实习呢？”这位学生很是失望：“我们按照规定付了三年的学费，但我们并没有完成专业培训。学校违反了最基本的承诺，与招生手册上讲的不符，随便改变课程设置，对待学生的未来如同儿戏，对我们不负责任。我们学生在教育中没有获得足够的知识就到了就业的关头，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竞争优势。”

“同意”实习

学生对统一分配实习的“同意”有时是值得怀疑的。在笔者的调查中，学生们被学校的老师成批成批地派出，以实习之名，去从事重复的组装工作。有一次，当学校宣布实习的消息时，学生十分匆忙地应对，有的甚至只来得及在粗米袋里装几件衣服便出发了。其中一位受访学生解释道：“我们的老师宣布，全省各职业学校都要与当地政府紧密合作，输送学生到富士康实习。”他补充说：“除非我们提供市医院开具的医疗报告，证明我们生病了，否则就不得不去实习。”根据富士康自己的公开声明，在2010年夏天有15万名学生在富士康实习，换句话说，在这家公司遍及全国的百万余劳动力当中，实习生占了15%的比例（Foxconn Technology Group, 2010: 2）。这意味着，富士康使美国迪斯尼旗下所属院校合作项目相形见绌。迪斯尼经常被引述为世界上最大的实习项目之一，该项目三十多年来从美国和海外的院校协作伙伴中累计接收了超过5万名实习生（Perlin, 2012: 6）。在广东深圳，2010年，单单以富士康专门为苹果公司进行加工的iDPBG事业群（integrated Digital Product Business Group）为例，当中便有来自两百多所学校的28 044名实习生在装配线上工作，比2007年的4539名实习生增加了六倍（富士康科技集团，2010: 23）。由于自己无法控制实习时间、地点和培训内容，一位学生受访者表达了他心中郁结的愤怒之情，谴责这个项目为“假实习”和“被实习”。

一位26岁的老师告诉我，一些学生在抵达富士康工厂后的第一周内不愿意去上班。

我要求学生好好控制情绪，冷静下来。仔细想想，如果你想离开，你们的父母难道不会失望吗？我到宿舍里探望学生们，看他们周二晚上是否觉得好点了。他们回答说：“不太糟咯。”我周五晚上又见了他们，他们说“很好哦”。他们逐渐习惯了工作的节奏。最后，当我问他们是否想离开时，他们回答说“不想啦”。

在整个实习期间，老师注重管理学生的情绪和行为，因为实习学生们留在工

作岗位上的人数比例是评估教师表现的主要标准。几位实习导师受访者声称“实习有真意义”，“增强了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后来快到月底的时候，笔者发现，原来驱使着老师们“尽忠职守”“恪尽己职”的动力来自于“双份工资”，一份是从学校得到的常规月工资，另一份来自富士康，作为对他们在实习单位现场监督工作的报酬。在2011—2012学年，每位教师每月从富士康获得了2000元的额外工资。这种把教师权威内嵌到公司的层级管理结构旨在加强劳工控制。因此之故，实习生是服务于“两个老板”。

如果个别老师并不为金钱利益所动，他也别无选择，被迫参与为富士康量身打造的巨大实习项目之中，这是因为富士康是当地政治经济中一个有显著影响力的合作伙伴。江老师解释说：

我们有必要立即回应教育部门的呼吁，让整个班级的学生组织起来，统一行动，因为实习不是打暑假工，不是说你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想想看，如果这个学期，五十个学生宁愿留在学校，我们根本就无法照顾到他们。我们和学生们一起去实习单位。

2011年9月至2012年1月，学校第一个学期，在四川富士康成都的新厂房里，就有7000多名学生（约占全厂劳动力数量的10%）在装配线上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工作。浦江某所职中为富士康在9月22日派来了162名学生，进行为期3个月的实习，但实习期因应iPad的生产需要被延长了。彭州市另一所规模更大的技术学校合共有309名学生参加实习，由三名男教师和三名女教师全程陪同。这一师生比例（1:50）是2011—2012年在富士康实习计划中保持的典型的师生比例。

在富士康，实习学生在任何时间不得选择辞工，他们并没有离职的自由。事实上，毕业的条件之一是完成整个实习及相关的要求。由于担心无法毕业，学生必须遵守富士康的实习制度，在流水线上工作，在工厂的集体宿舍生活。一位四十多岁的语文老师敏锐地观察到，富士康学生实习制度与20世纪30年代盛行的“包身工”制度并无不同。那是日据时代的上海，来自贫困村庄的走投无路的儿童和青少年被卖给包工头，然后被分配做苦工，被送到日本人的棉纺厂里，在恶劣的条件下昼夜劳作。在访谈中，他把这些旧社会里的苦孩子与现在的学生工做了类比。他苦笑着说道：“我就是现代的包工头。”这指的是他作为实习项目主要协调员的角色。他沉默了一会又继续说下去：“我只有一个女儿，十七岁了，现在正在准备高考。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不会让她来这家公司实习或工作。”最重要的是，他指出，“在富士康，把课堂和工作地点结合在一起的过程中并没有真正的学习。在今天的中国，职业教育已经积重难返，病入膏肓”。

实习生劳工的贬值

实习生劳工是廉价劳动力。2008年初在南京进行田野调查期间，Terry Woronov (2016: 124) 发现，簿记 (bookkeeping) 专业整个班级的学生被带到一所大学承担为期两周的无薪实习，当时他们还处于五年制职业教育课程的第二年。实习生被安排到大学的招生办，每天进行9小时的数据录入。她报称“大多数”的学生“同意”担任文书工作，而这一次的实习也被他们的老师评价为能够培养“良好纪律性”的“美好的工作经验”。久而久之，实习单位和学校的负责人采用在实习期间可以“获得实践经验和关系网络”等潜移默化的话语，驯训年轻的学生，使他们不再深思劳动关系里剥削的本质，对剩余价值的剥夺等问题也失去了敏感度。“实习”还是“工作”，二者的界线变得愈来愈模糊和隐蔽了 (Rodino-Colocino and Berberick, 2015)。

笔者调研发现，参照2011年1月的薪资制度，在富士康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郫县、广为人知的“iPad之城”中，虽然新员工和实习生每月都拿到950元的工资，但是实习生即使是在通过三个月的试用期之后，也没有资格获得每月400元的技能津贴。富士康管理人员引述“合理支付实习劳动”的法定要求，为这种区别性对待进行了辩护，其中“合理的实习报酬”在当时的国家法规中并没有明确规定^①。

成都富士康专门为苹果组装平板计算机。与其他很多公司一样，富士康始终认为实习学生不是员工，即使他们从事与生产工人相同的工作；也没有将实习生纳入当地政府管理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救济金、生育保险和养老保险。2015年，以广东省相关的社保标准为例，外资企业应该每月缴纳员工工资的29.2%，以及员工本人缴纳月工资的11%，作为基本的社会保险金。也就是说，如果一名员工的月收入总共为3000元，公司每月支付的保险费应为876元。富士康并没有为学生实习生上社保，因而节省了不少人力成本。

实习生无法享有相同的社会保障，这一现象值得关注。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要求用人单位和职工每月共同缴纳社会保险费（包括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金），且二者的保险费缴纳

^①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教育部和财政部，2007）的第八条规定，实习学生应该得到合理的实习报酬。

款项可以随本人转移并在全各地通用。在劳动力流动变得越来越普遍时，保险关系的连续性和缴费年限的累计很重要。现行法规规定职工要在达到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 15 年才可以领取基本养老金。但法律的条款只是愿望，还没有真正惠及广大员工（王发运、李宇，2011；陈志柔，2015；Schmalz, Sommer and Hui, 2016）。实习学生，实际上是“学生工”，更是完全被排除在政府建立的社会保险体系之外。

实习学生的劳务派遣

近年劳务派遣机构越来越多地采取新形式的劳动分包方式：派遣实习学生。我们如何去理解劳务派遣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商业模式，又如何理解颇为特殊的学生劳务派遣？

Feng Xu (2014) 在回顾中国劳务派遣业务于 20 世纪 90 年代快速扩张时指出，首批此类机构是由地方政府成立的，主要目的是有效吸纳城市下岗工人，以免他们破坏社会秩序。这些人力资源中介机构也为官员们创造了新的收入来源。其后，国内私营企业和跨国公司迅速加入到这个有利可图的市场，吸纳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毕业生等等（Zhou, 2013）。政府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1 年，全国有 2700 万（数据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到 3700 万（数据来自全总劳务派遣问题课题组）派遣工，其他一些估算高达 6000 万（Liu, 2014: 14）。其中，实习学生正加入到日益壮大的劳务派遣队伍中。

2016 年 8 月间，笔者在江苏省丹阳市的一家私营劳务派遣机构进行了初步的田野调查。该劳务派遣机构于 2011 年注册为全资私营企业，总部设在连云港，距丹阳 345 公里，4 小时车程。机构的负责人刚刚把一批来自江苏省内的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派往小型私营汽车零部件加工厂，不管其专业是什么。他们中的一些是在 2000 年出生的，才刚满 16 岁。在夏季，由于加班严重，学生最长的工作时间录得为每月 308 小时（按国家劳动法基本正常工时每月是 174 小时，加班不能超过 36 小时）。劳动报酬方面，学生得到每小时 10 元的“实习补助金”，相比之下，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是每



图 2 通过劳务派遣机构派遣实习学生

注：一些职业技术学校与营利性劳务派遣机构合作把学生送到工厂以从中获利

小时 15.5 元。换句话说，劳务派遣机构私吞了实习生的“标准小时工资”（即每小时 10 元）与企业实际支付数目之间的差额（这根据管理双方具体生意协商而异）。对于用工老板来说，使用派遣或外包的学生有助于减少管理和人力成本（见图 2）。

学生实习已高度市场化了。劳务中介机构负责招募和管理实习学生，如签订“劳务派遣（小时工）协议书”，以现金或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工资，以及扣除商业保险费。据笔者访谈的经理说：“每个学生每月都要扣除 55 元作为保险费，但是最便宜的保险计划只需 22 元。我们通过获取差额，也就是 33 元，来实现收益最大化。”该中介机构声称为学生投保了工伤保险，但没有购买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经理补充说：“向感冒或者不舒服的，以及其他有特别经济需要的学生，提前支付 100—200 元，像这种小事情对于留住他们是有帮助的。”

至于实习生的情况，据一位受访的经理助理说：

一些学生想在暑假期间和常规的学期期间赚一些钱，来支付自己的学费和日常开支，从而减轻父母的负担。在寻找有薪水的工作时，这些学生通过朋友的介绍和网上搜索，碰到了我们的劳务机构。另一些对学习或培训毫无期待。

他还评论了当今职校教师的角色，认为其具有商业性质而非教育性质：

教师也有兴趣（从学生实习中）获得好处。我们要么跟他们谈一笔好生意，要么直接通过我们当地的代理人与学生联系，我们称这些代理机构为下游供货商，而不是通过学校的老师来牵线搭桥。这样我们就不用支付佣金了。你知道吗，跟老师见面意味着要买烟，送礼，去 KTV 等等，很花钱。中秋节就要到了（9 月 15 日），到时候我们就要送他们美心月饼。所有这些都将花费很多然后才能得到回报。关于收益分配也就是彼此利润分配的谈判，经常需要经过好几轮，这太麻烦了。

更直接来说，被派遣的实习学生在人力资源供应链中已成为了商品。劳务中介机构经理在学生实习安排的过程中，似乎甚至不必通过谈论意义肤浅和空洞的道德规范，如“自学”或“做中学”，来为他们赤裸裸的生意算盘辩护。作为试验，这家劳务中介机构正在投资运营他们的第一所职业技术学校。日后他们打算将学生直接送到劳动力紧缺的企业，加强派遣管理，以换取更高的利润。

中国的实习经济规范化

法律学者 Earl Brown 和 Kyle de Cant（2014：195）认为，当实习项目“缺

乏任何相关的教育内容，它纯粹是为了满足雇主的根本利益，这时候，实习生最需要得到中国劳动法的充分保护”。遗憾的是，种种研究成果都表明，实习生受到的保护十分脆弱。笔者尝试进一步说明，企业对数以千万计的非正规工人包括学生工的使用，是受到中国工资持续上涨的推动。到2012年“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是2003年的2.5倍，年增长率10.8%”（Naughton, 2014: 21）。究其所以，有很多因素导致了这一趋势。2005年，政府废除农业税，引入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提高农民收入，以应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Frazier, 2014）。事实上，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而使得农产品价格面临下调压力时，这种地区性或结构性的收入差距更加恶化了，迫使新一届政府去直面三农问题。其中，改善农民的基本生活刻不容缓。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的展开，在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的一些地方，农业和非农就业的机会相应增加了，使得更多年轻的劳动力留在家乡发展（Zhan and Huang, 2013）。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沿海出口地区首次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劳动力短缺，而这种趋势也很快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内陆大城市出现，因为那里的投资者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下竞相奔向劳动力、土地和其他资源成本低的地区（Pun and Chan, 2012; Chuang, 2015）。人手需求紧张，加上年轻的打工群体频繁换工作，迫使雇主提高工资以招聘和留住工人（Shen, 2013; Wang and Zhai, 2013）。同时，中央领导一直在提高最低工资以重新平衡经济，刺激中国内需。政府调查显示，2015年中国农民工平均工资为3072元/月（含加班费），比2014年增长了7.2%（国家统计局，2016：表8）。因此，尽管政府对于禁止过度使用实习生设有相关的规定，它却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遵守。

结果，媒体和劳工权益倡导团体的报告清楚显示，一些实习学生其实就是童工，他们中最小的只有14岁，经常被严重加班，且完全缺乏指导，滥权的情况令人发指（BBC, 2012; DanWatch, 2015; Chakraborty, 2016）。在这些“放羊式实习”中，实习生感到困惑和孤苦无助，就像没有牧羊人的羊群。作为对这些乱象的回应，2016年中央政府最终采取措施保护实习学生的基本权利。

具体来说，职业学校应该按照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开展学生的实习活动。这《规定》取代了2007年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并已于2016年4月11日生效（教育部等，2016）。根据最

新的规定，“顶岗实习一般为6个月”^①。对于支付给实习生的最低工资也有明确规定：“工资不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试用期工资标准的80%（斜体字是作者加的）”^②。关于保险福利，职业学校和企业需要承担“共同责任”，为实习生提供商业性一般责任保险^③。而且，如果《规定》得到大力落实的话，会要求实习单位为学生实习提供丰富的教学内容和职业技能培训，并对实习学生进行全面的劳动保护，如每天工作八小时、无加班、无夜班^④。最重要的是，“任何工作场所”的实习学生人数不得超过实习单位在岗职工总数的10%，“任何工作岗位”的实习学生人数不得高于同类岗位在岗职工总人数的20%^⑤。

然而，企业、劳务机构、学校和地方政府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不容忽视。Rob Lederer 是电子工业公民联盟（Electronic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 EICC）的执行董事，这是一家拥有全球过百名企业会员的国际性行业协会。他承认，“可靠、优质劳动力的一大潜在来源可能就是学生工（student workers）”（EICC 和 REAP，2015a：2）。201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gram, REAP）的发起人之一、主任 Scott Rozelle 应 EICC 的邀请，设计了一个“中国职业教育体系监测评估项目”。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实现“负责任的职业教育”，并开始对人口稠密的河南省的118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进行试点（EICC 和 REAP，2015a，2015b）。2016年7月，该学术研究团队在省教育厅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制订出了一份“优质职业学校”名单，列明22所学校。这些学校的教学水平、学校资源和学生学习情况已一一经过了多样化标准的检验（EICC 和 REAP，2016）。

省级政府鼓励公司选拔优质学校的学生和毕业生进行实习和就业，为教师和学生提供经济奖励以提高绩效，也承诺为合作学校增加政府投资以促进其教育的长期发展。这是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团队建构出的“三赢行动研究”框架，旨在加强政府、学校和公司之间的长期合作（Rozelle, Loyalka and Chu, 2013）。过去

① 《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教育部等，2016）第十条规定，学生在实习单位的实习时间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确定，顶岗实习一般为6个月。

② 第十七条（教育部等，2016）规定，实习生应该得到的工资“不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试用期工资标准的80%”，且工资应该以货币形式及时、足额支付给学生。

③ 第三十五条（教育部等，2016）强调职业学校和实习单位的共同责任，为实习学生投保实习责任保险，包括学生实习期间遭受意外事故及人身伤亡。

④ 第十六条（教育部等，2016）禁止实习单位安排学生加班和夜班。

⑤ 第九条（教育部等，2016）设置了在工作岗位和工作场所层面使用实习学生的法律限度。顶岗实习学生的人数不超过实习单位在岗职工总数的10%，在具体岗位顶岗实习的学生人数不高于同类岗位在岗职工总人数的20%。

三年，学术研究人员与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业协会携手合作，针对职业学校进行整改，要求他们为学习状况不良和实习安排不力负责。然而，这一项目不但没有提及在工作场所层面屡屡发生的管理问题以及侵权行为，包括违反实习规定的事实，却一味回避，模糊了焦点。

结 论

Greig de Peuter, Nicole Cohen 和 Enda Brophy (2015: 331) 精辟地指出，实习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以此来窥探和审视今天竞争激烈的生活、劳动和学习状况。在这历史时刻，弥漫着一份深沉的不安全感 (precarity)”。年轻的缺乏经验的学生，和许多其他低技能的工人，面临着一纸文凭贬值的压力。同时，社会管治效率低下，劳工保障不足，再加上全球服务业和制造业生产日趋“弹性化”，带来了巨大的就业挑战和不确定性 (Kuruvilla, Lee and Gallagher, 2011; Huang, 2011; Standing, 2011; Warhurst et al., 2012; Chan and Selden, 2017; Lee, 2016)。本文认为，“学校企业一体化，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师师傅一体化，学生员工一体化”的承诺已然幻灭了。

Ross Perlin (2012: 23) 在他关于当代美国和欧洲实习状况的书《实习国家》(Intern Nation) 中一针见血地评论道，“实习这个词的重要性正在于它的模糊性” (斜体为原文所加)。在中国，实习学生已成为重要的劳动力来源，数量随着职业教育扩张和就业非正规化而逐渐增加。对于参加实习就可以找到体面的工作的希望，早已经遭到了全面冲击。许多的案例表明，“实习活动”违反了实习的基本理念。雇主成为了最大的得益者，取得廉价的、可自由支配的劳动力。我们看到，许多学校，甚至是那些重点学校，在面对财政和政治双重的压力下，都无法使学生免于违反法律的实习活动。

在人口增长放缓和人口老龄化的时代，越来越多年轻的、职业技能训练有素的工人会在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这样，中央领导试图加强劳动法和实习条例以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振兴经济。然而，当政府堵上各种法律漏洞，企业就通过规避新的条例和法规来应对，继续滥用实习制度。Eli Friedman 和李静君 (Friedman and Ching Kwan Lee 2010: 513) 有洞察力地指出，现行劳工体制普遍是“成问题的，不仅仅是从非正规工人的角度出发，而且也是从正规工人的角度来看待，后者会发现越来越难以对其雇主提出集体要求”。更糟糕的是，省级和下级政府不惜以牺牲工人权益为代价，以扭曲法律法规为手段吸引投资，加快资本内迁的进程。这样，要切实有力地保护劳工，特别是学生工，将需

要国家、企业和民间社会作出更大的共同的努力。

参考文献

- 陈志柔 (2015):《中国威权政体下的集体抗议:台资厂大罢工的案例分析》。《台湾社会学》第30期,第1~53页。
- 富士康科技集团 (2010):“‘合作·共赢’:iDPBG召开实习生总结暨表彰大会”鸿桥183,12月31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0a):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July 29. http://www.gov.cn/jrzq/2010-07/29/content_1667143.htm.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0b):关于应对企业技工荒进一步做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工作的通知,3月10日。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044/201005/87769.html>.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5):高中阶段学生数的构成,8月18日。 http://en.moe.gov.cn/Resources/Statistics/edu_stat_2014/2014_en01/201509/t20150902_205030.html.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财政部 (2007):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6月26日。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566/201001/xxgk_79114.html.
- 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中国保监会 (2016):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4月11日。 http://www.moe.edu.cn/srcsite/A07/moe_950/moe_721/201604/t20160426_240252.html.
-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 (2014):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plan, 2014—2020),6月16日。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30/201406/170737.html.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16):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4/t20160428_1349713.html.
- 沈原编 (2013):《清华社会学评论——社会转型与新生代农民工》第6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发运、李宇 (2011):《2010年中国社会保险制度建设新进展》,载汝信、陆学艺、李培林编,《201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第48~5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同信、翟玉娟编 (2013):《深圳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 BBC (2012).“Foxconn admits employing under-age interns.” Oct. 16. <http://www.bbc.com/news/technology-19965641>.
- Brown, Earl V. Jr., and Kyle A. deCant (2014).“Exploiting Chinese interns as unprotected

industrial labor.” *Asian-Pacific Law and Policy J.* 15, 2: 150~195. http://blog.hawaii.edu/aplpj/files/2011/11/APLPJ_15_2_Brown_deCant_FINAL.pdf.

Butollo, Florian, and Tobias ten Brink (2012). “Challenging the atomization of discontent: patterns of migrant-worker protest in China during the series of strikes in 2010.” *Critical Asian Studies* 44, 3: 419~440.

Chakraborty, Aditya (2016). “Your new iPhone’s features include oppression, inequality-and vast profit.” *The Guardian*, Sept. 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sep/19/your-new-iphone-features-oppression-inequality-vast-profit>.

Chan, Chris King-chi, and Elaine Sio-ieng Hui (2014).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China: from ‘collective bargaining by riot’ to ‘party state-led wage bargaining.’” *China Q.* 217: 221~242.

Jenny Chan, Ngai Pun, and Mark Selden (2015). “Interns or workers? China’s student labor regime.” *Asian Studies*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1, 1: 69~98. <http://www.air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PublicationJournal?PublicationID=P20151027006&.type=P001>; and, *Asia-Pacific J.* vol. 13, issue 36, no.1 (Sept.) 7, <http://apjif.org/-Jenny-Chan/4372>.

Jenny Chan, and Mark Selden (2017). “The labour politics of China’s rural migrant workers.” *Globalizations* 14 (2): 259-271.

China Labor Bulletin (2015). “Five years on, Nanhai Honda workers want more room from their trade union.” May 15. <http://www.clb.org.hk/en/content/five-years-nanhai-honda-workers-want-more-their-trade-union>.

Chuang, Julia (2015). “Urbanization through dispossession: survival and stratification in China’s new townships.” *J. of Peasant Studies* 42, 2: 275~294.

DanWatch (2015). “Servants of servers: rights violations and forced labour in the supply chain of 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equipment in European universities,” Oct. 5. <https://www.danwatch.dk/en/undersogelse/servants-of-servers/>. de Peuter, Greig, Nicole S. Cohen, and Enda Brophy [eds.] (2015). “Interrogating internships: unpaid work,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higher education.”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and Critique* 13, 2: 329~602.

EICC and REAP [Electronic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 and Stanford University’s 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gram] (2015a). “Creating and evaluating a credentialing system for vocational schools in China.” Phase 2 final report. <http://www.eiccoalition.org/media/docs/publications/EICC-REAPReport2015.pdf>.

EICC and REAP [Electronic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 and Stanford University’s 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gram] (2015b). “A coalition for responsible vocational education.” 7-min video. <https://vimeo.com/140385551>.

- EICC and REAP [Electronic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 and Stanford University's 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gram] (2016). "Electronics industry recognizes vocational schools in China for excellence." <http://www.eiccoalition.org/news-and-events/news/credentialed-schools-china/>.
- Evans, Peter, and Sarah Staveteig (2009).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employ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Pp. 69~82 in Deborah S. Davis and Wang Feng (eds.), *Creating Wealth and Poverty in Postsocialist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 Press.
- Foxconn Technology Group (2010). "Foxconn is committed to a safe and positive working environment," Oct. 11. http://regmedia.co.uk/2010/10/12/foxconn_media_statement.pdf.
- Frazier, Mark W. (2014). "State schemes or safety nets? China's push for universal coverage." *Daedalus* 143, 2: 69~80.
- Friedman, Eli (2014). *Insurgency Trap: Labor Politic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 Press.
- Friedman, Eli, and Ching Kwan Lee (2010). "Remaking the world of Chinese labour: a 30-year retrospective." *British J.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48, 3: 507~533.
- Gallagher, Mary E. (2005). *Contagious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abor in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 Harvey, Davi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 Hoffman, Lisa (2001). "Guiding college graduates to work: social constructions of labor markets in Dalian." Pp. 43~66 in Nancy N. Chen, Constance D. Clark, Suzanne Z. Gottschang, and Lyn Jeffery (eds.), *China Urban: Ethnographies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Durham, NC: Duke Univ. Press.
- Hope, Sophie, and Joanna Figiel (2015). "Interning and investing: rethinking unpaid work, social capital, and the 'human capital regime.'"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and Critique* 13, 2: 361~374.
- Huang, Philip C. C. (2011).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the role of informal economic practices." *Modern China* 37, 1: 3~43.
- Ip, Iam-chong (2015). "Negotiating educated subjectivity: intern labor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and Critique* 13, 2: 501~508. <http://www.triple-c.at/index.php/tripleC/article/view/596/761>.
- Kuczera, Malgorzata, and Simon Field (2010). "Learning for jobs: OECD review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options for China."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http://www.oecd.org/china/45486493.pdf>.
- Kuruvilla, Sarosh, Ching Kwan Lee, and Mary E. Gallagher [eds.] (2011). *From Iron Rice Bowl to Informalization: Markets, Workers, and the State in a Changing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 Press.

- Lee, Ching Kwan (2016). "Precarization or empowerment? Reflections on recent labor unrest in China." *J. of Asian Studies* 75, 2: 317~333.
- Ling, Minhua (2015). "'Bad students go to vocational schools!': education,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migrant youth in urban China." *China J.* 73: 108~131.
- Liu, Genghua (2014). "Private employment agencies and labour dispatch in China." SECTOR Working Paper No. 293.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sector/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246921.pdf.
- Lyddon, Dave, Xuebing Cao, Quan Meng, and Jun Lu (2015). "A strike of 'unorganised' workers in a Chinese car factory: the Nanhai Honda events of 2010." *Industrial Relations J.* 46, 2: 134~152.
- Naughton, Barry (2014). "China's economy: complacency, crisis & the challenge of reform." *Daedalus* 143, 2: 14~25.
- Otis, Eileen M. (2009). "The labour of luxury: gender and generational inequality in a Beijing hotel." Pp. 54~68 in Deborah S. Davis and Wang Feng (eds.), *Creating Wealth and Poverty in Postsocialist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 Press.
- Perlin, Ross (2012). *Intern Nation: How to Earn Nothing and Learn Little in the Brave New Economy*. Updated ed. London: Verso.
- Pun, Ngai, and Anita Koo (2015). "A 'world-class' (labor) camp/us: Foxconn and China's new generation of labor migrants." *Positions: Asia Critique* 23, 3: 411~435.
- Pun, Ngai, and Jenny Chan (2012). "Global capital, the state, and Chinese workers: the Foxconn experience." *Modern China* 38, 4: 383~410.
- Rodino-Colocino, Michelle, and Stephanie N. Berberick (2015). "'You kind of have to bite the bullet and do bitch work': how internships teach students to unthink exploitation in public relations."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and Critique* 13, 2: 486~500.
- Rozelle, Scott, Prashant Loyalka, and James Chu (2013). "China's human capital challenge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 Presentation on "Responsible electronics 2013: student workers." Oct. 2. <http://www.slideshare.net/EICCoalition/responsible-electronics-2013-student-workers>.
- Schmalz, Stefan, Brandon Sommer, and Hui Xu (2016). "The Yue Yuen strik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labour unres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Globalizations*: 1~13. <http://dx.doi.org/10.1080/14747731.2016.1203188>.
- Smith, Chris, and Jenny Chan (2015). "Working for two bosses: student interns as constrained labour in China." *Human Relations* 68, 2: 305~326.
- Standing, Guy (2011).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 Su, Yihui (2010). "Student workers in the Foxconn empire: the commodification of education and labor in China." *J. of Workplace Rights* 15, 3-4: 341~362.

- Warhurst, Chris, Françoise Carré, Patricia Findlay, and Chris Tilly [eds.] (2012). *Are Bad Jobs Inevitable? Trends, Determinants and Responses to Job Qual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 Woronov, T. E. (2016). *Class Work: Vocational Schools and China's Urban Youth*.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 Press.
- Xu, Feng (2014). "Temporary work in China: precarity in an emerging labor market." Pp. 143~63 in Judy Fudge and Kendra Strauss (eds.), *Temporary Work, Agencies, and Unfree Labor: Insecurity in the New World of Work*. New York: Routledge.
- Zhan, Shaohua, and Lingli Huang (2013). "Rural roots of current migrant labor shortage in China: development and labor empowerment in a situation of incomplete proletarianizatio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48: 81~111.
- Zhang, Lu (2015). *Inside China's Automobile Factories: The Politics of Labor and Worker Resist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 Zhou, Ying (2013). "The state of precarious work in China."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7, 3: 354~372.

Intern Labor in China

Jenny Chan

Abstract: Internships have become integr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This article looks into the quasi-employment arrangements of student interns, who occupy an ambiguous space between being a student and being a worker at the point of production. Some employers recruit interns on their own, while others secure a supply of student labor through coordinated support of provincial and lower-level governments that prioritize investments, as well as through subcontracting services of private labor agencies. The incorporation of teachers into corporate management can strengthen control over students during their internships. While interns are required to do the same work as other employees, their unpaid or underpaid working experiences testify that intern labor is devalued. Exposés of abuses, such as using child labor in the guise of interns, have pressured the Chinese state and companies to eventually take remedial action. Reclaiming student workers' educational and labor rights in the growing intern economy, however, remains contested.

Keywords: intern labor, student workers, internships, vocational schools, labor agencies, the state, China